

Slightly Out of Focus

Robert Capa

Slightly Out of Focus

Robert Capa

失焦

〔匈牙利〕罗伯特·卡帕 著

徐振锋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焦 / (匈) 罗伯特·卡帕著; 徐振锋译. —3 版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8-0337-5

I. ①失… II. ①罗… ②徐… III. ①卡帕 (Capa, Robert 1913-1954) - 回忆录②第二次世界大战 - 史料

IV. ① K837.125.42 ②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5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1720mm×96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60千字 图片: 89幅

2017年10月第3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42 年 夏

再也不必一早就起床了。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幢三层楼房的顶层，带一个全景天窗，大床放在一角，电话搁在地板上。没有别的家具了，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晒醒。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也不想知道。现金只剩一枚五分硬币。要是电话不响，没有人给我来一顿午饭，一个工作，或是一笔贷款，我会就这么躺着不动。电话没响，但我的胃却叫个不停。我发现继续装睡是没有用的。

我翻了个身，看见门缝下面房东太太塞进来的三封信。过去几周里，我只收到过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账单，所以这神秘的第三封信最终让我起了床。

很显然，第一封是来自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第二封是司

法部的，通知我，罗伯特·卡帕，曾为匈牙利公民，现在身份未定，被列为潜在的外国敌对分子，所以我必须上缴我的照相机、望远镜和枪支等物品，而且任何离开纽约 10 英里以上的旅行我都必须特别申请。第三封是《科利尔》(Collier's) 杂志的编辑写来的。他说杂志在仔细评估了我的作品剪贴簿两个月后，忽然确信我是一个出色的战地摄影师，并决定给我一项特殊的拍摄任务。杂志社已经为我订好了船票，48 小时后前往英国，信里还附有一张 1500 美元预付金的支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一台打字机并有足够多的字符可用¹，我会回信给《科利尔》杂志，告诉他们我是个外国敌对分子，我甚至都不能去新泽西，更不用说英格兰了，我带着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敌国侨民财产委员会 (The Enemy Aliens' Property Board)。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五分硬币。我决定扔个硬币试试运气。如果是正，就算顶着谋杀的罪名也要去英国；如果是反，我就退回支票并向《科利尔》解释这个情况。

我抛了硬币，它掉在地上——是反面。

然后我马上意识到，硬币里是找不到未来的，我将保留

1 作者所处时代，主要为针式打字机。——编者

并兑现那张支票，无论如何都要到英国去。

纽约的地铁接受了我的硬币，银行也接受了支票。我在银行旁边的詹森餐厅花了 2.5 美元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好了，现在一切都定了，我不可能拿着 1497.5 美元再回头去《科利尔》杂志社，那一定会有麻烦的。

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认我的船将在大约 48 小时之后起航。然后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想弄清楚该从哪儿开始。我总共需要一张征兵局的豁免证，一张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出具的出入境许可证，一张英国签证，以及用来贴签证的护照。要搞到这些东西，我可承受不起一上来就碰壁，所以我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听我解释并理解我的人。我碰到了麻烦。可是，美国人才刚开始意识到什么是麻烦，而英国人已经参战两年多，应该已经习惯麻烦了。我决定先从英国这边入手。

从詹森餐厅到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有一班去华盛顿的飞机。我买了一张机票——《科利尔》的钱还有很多。

两个半小时之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驻华盛顿的英

国大使馆门前，我要求见使馆的新闻专员。接见我的是一位身材单薄的英国绅士，他的脸很红，表情厌倦。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于是我给了他两封信，一封是《科利尔》杂志社的，一封是司法部的。他读了第一封信，没有任何反应，但他读完第二封信时，嘴角闪过一丝微笑。多少受了这个微笑的鼓励，我掏出那封还没拆过的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信递给他，我知道那是给我的停电通知。他看了之后示意我坐下。

他终于开腔说话，想不到竟然充满了人情味。战前他一直是个地质学教授，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墨西哥快乐地研究火山顶层的土壤构成。他不太关心政治，但这是战争，他们征召他做了一名新闻官。从那之后，他的工作就是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否决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他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把他以前处理过的所有案子都比下去了，我是冠军！我心里充满了对他和我自己的同情，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饭店，在等位子的时候喝了无数杯马提尼。我的英国同伴在喝了酒之后热情了不少，我开始感觉到《科利尔》杂志，这位专员以及大英帝国都已经和我站在一起了。等到终于有了位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一份生蚝。五年前，我在法国花重金接受了酒文化教育，至今还记得在每个

有关彼得·温莎勋爵（Lord Peter Wimsey）的神秘故事里，吃生蚝时都要配上一种叫蒙哈榭（Montrachet）的最好的勃艮第白葡萄酒。蒙哈榭 1921 列在菜单的最后一行，非常贵，但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选择。专员告诉我，15 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征服了他的新娘。所以当第一瓶酒喝光的时候，我们正在大谈对法国以及蒙哈榭的热爱；喝光第二瓶时，我们达成了一个伟大的共识，一定要把德国鬼子赶出“美丽的”法兰西。喝完咖啡，就着卡洛斯一世（Carlos Primero）白兰地，我跟他讲了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同共和国军待了三年的经历，以及我是何等理所当然地痛恨法西斯。

回到大使馆，他打电话给国务院。他找到了某个高层人物，并直呼其名，说“老朋友卡帕”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有非常重要的事务要去英国，会在 15 分钟后到他那儿办出入境许可证。挂了电话之后他给了我一张写着名字的纸条。15 分钟后，我如约来到国务院。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得体的绅士，他在一张表格上填了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早 9 点到纽约港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入境办公室领取许可证。然后他送我到门口，松了口气，像老朋友一样拍拍我的背，对我眨着眼，并祝我“好运！”

回到大使馆，我发现我的专员朋友表情严肃，甚至有点

担忧，直到我告诉他第一步十分顺利，他才放松下来。这一次他打电话给驻纽约的英国总领事。他说“老朋友卡帕”将前往英国，万事俱备，只缺护照。过了10分钟，打了几个电话之后，这位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教授已经和我在一个小酒吧里举杯预祝我旅行的成功了。现在我该去赶飞机了，在离开之前，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英国的每个港口传信说我会搭船来英国，随身会携带照相机和胶卷，我会得到各方的帮助，被安全送达伦敦的海军部大楼。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英国人真是一个伟大，他们具有出众的幽默感，当你身处绝境，英国人会是你最好的帮手。

* * *

第二天早上，纽约的英国总领事认为我的情况很不平常——但这场战争同样很不平常。他给了我一张看上去很平常的白纸，让我写下姓名，解释没有护照的原因，并注明我要去英国的事由。

我写下关于我的情况，罗伯特·卡帕，生于布达佩斯，霍尔蒂海军上将（Admiral von Horthy）和匈牙利政府从没喜

欢过我，我也从没喜欢过他们。自从希特勒吞并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领事馆就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是匈牙利人。所以，只要希特勒还控制着匈牙利，我就肯定拒绝匈牙利国籍。我从小就受到我的犹太祖父的照顾和庇护，所以我痛恨纳粹，并认为我的摄影作品会对反抗纳粹的宣传工作有用。

我交还这张纸的时候有点担心我的拼写，但他在上面盖了章，用一条蓝带捆着它，就这样，我的护照诞生了。

早上我就要出发了，还缺四五张次要的许可证没搞到。我的母亲，她就住在纽约，一直陪着我。我忙着搞这些必要的盖章的纸片时，她就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每次我回来的时候，她都静静地坐着，试图从我的表情里读出答案。那天早上，她内心的挣扎肯定十分剧烈，为了我的前途，她希望我能拿到所有的许可证顺利离开；而作为一位母亲，她却在心里祈祷最好有什么事出错能阻止我再次踏入战争。

我终于办齐了所有的证件，但比开船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最后的希望就是我的船已经开走了。

但我们赶到码头的时候，那艘又脏又旧的商船还停在那

儿。一个高大的爱尔兰警察拦住了我，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利索点。”

我母亲只能送到这里了。此时，她不再扮演“战时伟大母亲”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个内心充满爱的犹太母亲，长久以来压抑的泪水从她美丽的褐色眼睛里涌出。那个身高两米的爱尔兰警察伸手揽住我一米五几的母亲说道：“女士，我请你喝一杯。”

我最后吻了母亲一下，然后奔向船的跳板。

我最后看到的美国是那爱尔兰警察和我母亲走向酒吧的背影，矗立在酒吧旁边的摩天大楼仿佛突然微笑了起来。

二

我上船虽然匆忙，却还不是最后的迟到者，在我的脚后还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我就这样大步迈出了美国国土。

站在跳板尽头的船长转向他的船员说道：“好啊，这最后两个总算来了，真该遭报应。”接着他看见了我，问，“你是谁？”

“我是个特例，船长。我是个旅行中的敌侨。”

“呵呵，我船上装的货物已经够奇怪的了。让我到船舱里看看旅客名单上是怎么写你的。”

他在旅客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并查看了我的证件，没提任何问题。

“战争爆发前，”他对我说，“我从西印度群岛运送香蕉和游客到英国。现在，我每次运回家的是腊肉而不是香蕉了，

而上层甲板上装的是拆卸的轰炸机而不是游客了。我的船没以前干净了，卡帕先生，但我的旅客舱位空着，而且我相信你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我找到了我的舱位，安顿下来。发动机在嗡嗡地响着。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我终于踏上回欧洲的路了。我的思绪也回到了过去……两年前，我刚从法国飞来，就在这同一个港口，那时我还在担心他们会不会让我入境。那时我的证件也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我的身份是一个农业专家，要去智利改善那里的农业状况，带着一张允许我在美国停留 30 天的临时签证。那时要在这里登陆可不是容易的事……很难说服他们让我留下……而现在我还只是靠着一个英国教授的奇迹才能离开这里……

我拿出照相机——自从 1941 年 12 月 8 号之后我就再也没被允许碰过它——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我又是个记者了。

凌晨时分我们的船停靠在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船长上岸去接受指令。晚些时候，等他回来后，我得知我们的船将加入一支快速船队，而且我们的船还是领头船，船队

的指挥官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他将在我们船的舰桥上指挥整个船队。

我想象着在《科利尔》杂志上登出一篇四页的激动人心的报道，标题叫《护航舰队的指挥官》，配上一幅戏剧性的照片，照片里一位老船长颤颤巍巍站于舰桥之上，他身后的船在波涛汹涌中起伏。

晚餐过后，指挥官传令让我过去。驾驶台里没什么灯光，但我看清楚他的长相后颇为失望。我想象中年迈的、跌跌撞撞的老水手在现实中是一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的 50 多岁的绅士，跟我想象中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他也有两道浓密的眉毛。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回答说他是爱尔兰人，然后马上接着说他对电影圈非常感兴趣，很喜欢某些好莱坞女明星。整个旅程他都必须坚守在舰桥，但我可以每晚都上来跟他讲讲好莱坞的趣事，作为交换，他很愿意告诉我关于这支船队的任何事情。

这笔交易很不公平。因为这位指挥官熟知他的船队，而我却从没去过好莱坞。但我不忍心告诉他，他读错了我的名字，我并不是那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而是鲍伯·卡帕（Bob Capa）。于是在接下来的旅程

中，我不得不扮演山鲁佐德¹，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件事不会真的持续一千零一夜！

我们在港口过的夜。早上，指挥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见见船队的几位船长。我们船队的大多数船都是外国来的，指挥官总要费老大的劲才能跟他们说清楚。来自瑞典和挪威的船长请我们喝了威士忌，他们都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荷兰船长有不错的杜松子酒，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法国船长有上好的白兰地，我做了翻译；说着飞快的希腊语的希腊船长有一种极烈的，叫做 Ouzo 的茴香酒。我们总共去了 23 艘船，喝到了 23 个国家的好酒，见识了 23 种民族性格。在回去的路上，指挥官不停抱怨着这些疯狂的外国人，让我为自己会说英语而感到很骄傲。

下午船队很快排好了队形，所有的船分成四排，每排六艘船，每船之间相隔 1000 码。护卫舰队由一艘驱逐舰和五艘轻型护卫舰组成，看上去有点单薄。

在舰桥的第一晚，主要是指挥官在讲其自身经历。一战期间他曾是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到 1918 年，他已经领导着整

1 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以夜复一夜给苏丹讲有趣的故事而免于死。——译注

支舰队了。他不断地提到像泽布吕赫（Zeebrugge）和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这样的名字。他讲完自己的故事，就开始问我丽莲·吉许¹最近怎么样。我告诉他吉许小姐身材保持得很好。那晚我离开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开头。

海上的最初四天我在无聊中度过。白天我拍摄从桅杆到机房见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晚上我就到舰桥上给指挥官讲述我在牙医诊所的娱乐杂志里看到的所有明星故事。我向他暗示我是个很正派的人，但他仍然认为我肯定也多多少少卷入了这些好莱坞的丑闻。作为交换，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率舰队开往苏联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靴子竟冻结在甲板上，整整三天没法移动。指挥官在公海上航行时从不喝酒，而我的口袋里装着随身的酒壶，边跟他聊边来上两口，用来抵抗寒冷。午夜过后，靠在舰桥的栏杆上，我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第三大道（Third Avenue）某个漆黑的酒吧里。

到目前为止，我的“北大西洋战役”过得非常愉快——事实上简直是太愉快了。然而，船员们完全不理会对动作

1 Lillian Gish, 美国电影女演员。代表作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太阳浴血记》等。——编注

场面的渴望，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将来登在《科利尔》杂志上的报道是不是精彩。

第五天我碰到了真正的北大西洋大雾。驱逐舰在我们的船旁边停下，用信号灯给我们传信息。指挥官转过头对我说：“如果你在大雾里也能拍照，卡普拉，这下你就能抢到独家新闻了，一队德国潜水艇在前面 30 英里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不管有没有雾，指挥官都决定改变航线。现在我们在舰桥里还看不见我们的船尾，而且还严禁使用无线电通讯，与船队保持联系只能使用雾号（foghorn）。那艘应该在我们左面的挪威油船从右面回应了两长三短的汽笛信号；那艘希腊货船原先是船队的最后一艘船，离我们有 3 英里，现在却在我们船头前方 50 码的地方按了三声长汽笛。总之，这 23 艘船上的雾号发出的号声响得连柏林都能听见。指挥官咒骂着所有远的或近的船长。但此时没必要担心撞船。德国潜水艇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的护卫舰正在投放深水炸弹。

我把我珍贵的护照和《科利尔》杂志给的钱裹进防水烟草袋里，心里却为我无法拍到如此精彩的场面而感到遗憾。

指挥官发出信号让船队散开，从现在开始，每艘船就得靠自己了。不止一次我听到其他船向我们的船靠近，而且靠得很近，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